

埃塞俄比亚“大学服务计划”的历史考察^{*}

陈明昆 徐淑兰

【摘要】 埃塞俄比亚早期的大学被赋予了厚重的社会责任,在办学目标上具有明显的“农村导向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埃塞大学校园里开展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大学服务计划”。计划要求在校大学生必须有一学年的时间深入到农村社区开展为民服务。该计划在组织管理、目标任务、服务期限上十分明确,服务内容与学生的专业学习相联系,对社会进步是一种促进,对学校、学生本身是一种锻炼。该计划实施的社会效应远远超过发起者的预期,甚至引起过世界关注。虽然由于政治原因,该计划最终不得不草草收场,但大学的这种责任和精神却受到传扬。

【关键词】 期望 责任 大学服务计划 农村

【作者简介】 陈明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金华 321004)
徐淑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金华 321004)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埃塞”)是一个风云际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都十分突出的敏感时期。五十年代刚刚诞生的埃塞大学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在社会期望与责任感的驱使下,埃塞的大学生们用自己的行动上演了一场改写历史的壮举。这个壮举可以用两条线索来显示:一条是大无畏的政治抗争——反对社会不公,唤起民众意识;另一条是义无反顾的赤子之举——旨在服务社会,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其中的“大学服务计划”就是一个生动写照。这两条线索一刚一柔、交织发生,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最终导致了海尔·塞拉西君主政权的垮台。本文将从历史的视角着重考察1964年开始的埃塞“大学服务计划”的背景、由来、过程和结果。

一、背景分析:社会期望与大学的责任

1950年12月,埃塞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学院(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Addis Ababa, UCAA)成立。1961年在

合并UCAA等六所学院¹的基础上成立“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Haile Selassie I University, HSIU,简称“塞拉西大学”)。1975年塞拉西大学改称“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也许是长期没有大学的缘故,当埃塞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大学时,便把它置于一个显赫的地位,甚至把大学比喻成“盲人国度里独具慧眼者”,^[1]国人对大学寄予了厚望。许多具备现代化思想的人士认为:埃塞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在了世界后面,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现代化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他们希望大学能够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而且认为现代大学在社会责任方面应该超越传统大学的角色地位。如,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培养知识和能力、促进科学发展与研究、提供社会服务和培训人力资源等方面,大学理应成为自由、真理和知识传播的先导。同时希望大学能够扮演一定的政治角色,能成为社会变迁的发起者,特别是在埃塞这样一个观念禁锢、经济落后、知识贫乏、现代教育稀缺的君主帝国统治的国度里尤为重要。一些埃塞学者更是坚信:

^{*} 本文为2007年浙江师范大学招标课题“非洲高等教育国别研究工程”之子课题“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研究”内容的一部分。

¹ 这六所学院分别是: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学院、阿莱玛亚皇家农业和机械工程学院、贡德尔公共卫生学院、皇家工程学院、埃塞俄比亚和瑞典联合建筑技术学院、圣三一技术学院。

发展中国的大学应该肩负起比西方国家大学多得多的社会责任,而大学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就必须赋予大学更多的自由和自治,其中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是最基本的前提。^[2]正是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埃塞大学充当起了变革社会、服务社会、追求自由和知识批判等重要角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埃塞社会的贫富悬殊十分巨大,广大的农民过着极度清苦、朝不保夕的生活,而一小部分地主豪绅、达官贵人却极至奢华,大学生们对此十分反感。即便在大学校园,大学生们由国家供养着,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那些来自贫苦农村的大学生,还是摆脱了朝不保夕的日子。正像《生活的比照》^[3]作者泰米如·费依萨(Tamiru Feyissa)在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大学校园舒适优越的生活、学生们所享有的社会特权与他们自己在农村家庭的悲惨境遇形成了鲜明对比。巨大的对比与反差意识越来越强烈,学生们对待穷人和处境不利群体的同情心也越来越强烈,“帮助穷人”成了大学生的自发行为。

早在1959年,UCAA的学生们便自发组成了一个社区服务委员会,其目的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生们的服务内容和活动范围都在不断扩大,如自发为校园里的各类勤杂人员免费讲授夜校课程,在康复中心(Rehabilitation centre)为穷人的孩子开办识字学校等。有的还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流动学校,在一种特制的移动卡车上为牧民和农民家庭的子女教授识字课程。

学生们在帮助穷人、接触社会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一些激进学生甚至萌发了变革思想和抗争行为。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未来世界的主宰,并以公众的名义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联合力量,志在唤醒民众。在大学生们出版的刊物中,有相当部分内容反映了当时埃塞社会的不公问题,如当时学生办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过的文章《让穷人说话》(Let the Poor Speak Out)、《生活的比照》(The Contrasts of Life)等都引起过很大反响。^[4]

学生们把写成的诗歌用阿姆哈拉语(Amharic)刊登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以示向国家权威挑战,有的诗歌则表达出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农民是爱国者,农民是纳税人,农民却总是

受到统治者的剥削”,这些诗歌被印刷并被广泛传播。在埃塞,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经济和生活来源,但是大部分土地却被极小部分人所占有,广大的农民无地可耕。出于社会正义,大学生们发动了一场为农民争取土地的运动,他们打出了这样的口号:“我们要求议会不要一次次的讲封建权利已减少,而是要把所有的土地分给所有的农民!”^[5]学生们还利用集会和游行来唤起后来者和市民的社会意识。

这充分说明大学生们开始关注他们所说的“校园外”(off-campus)问题。对“校园外”问题的关注最终导致了学生们“社会责任感”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一种是与政府的直接对峙——在1969年春汇集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和骚乱,引起了政府的强烈反感和武力压制;另一种是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学服务计划”(the Ethiopian University Service Program, EUSP)——大学生们把目光投向了养育他们的农村和农民。

二、“大学服务计划”的历史考察

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埃塞大学在教育目标上具有明显的“农村导向性”(rural-oriented),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占总人口95%的农村服务。全国唯一的一所大学——塞拉西大学有两个校区坐落在农村,一个是贡德尔公共卫生学院,另一个是阿莱玛亚农学院,前者主要为农村培养公共卫生人员,后者直接为农业发展培养专业人士。农村导向性的另一标志是农村“卫生诊所”项目——就是把卫生学院的学生选派到农村卫生所(站)工作一定时期,学生在卫生所从事的实际锻炼内容作为专业教学训练的一部分。“卫生诊所”项目成为埃塞大学服务计划的成功范例,后来这一模式被推广到非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卫生诊所”项目也是埃塞“大学服务计划”的部分体现。下面对该计划的由来、过程及结果做一历史考察。

(一) 埃塞大学服务计划思想的由来

埃塞大学服务计划始于1964年。有趣的是,这项为社会服务思想的形成却来自在校大学生们,这或许是出于他们对穷人的关注或曾经与穷人为伍的原因。据研究发现,埃塞早期的大学在

教学过程中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如在早期出版的塞拉西大学学生的一本诗歌集中,一些作品就表露出了对农村穷人的亏欠感。《埃塞农村与城市的分裂》^[6]的作者莫斯非(Mesfin Wolde Mariam)写到:埃塞农村地区停滞的趋势是由于城市的特权地位造成的,而且随着城市马路、工厂、学校、卫生服务等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农村与城市的分裂不可避免。莫斯非后来写了一封信给大学的校长,建议所有在校大学生在毕业前必须进行为期一年的农村义务服务活动,活动小分队可由不同专业学生组成,十到二十人为一组,分派到农村某个地区进行社区的扫盲活动和思想意识的改造活动。莫斯非认为,这项活动如果坚持五到十年将可极大改变农村地区的社会现状。

有一些学者认为,大学服务计划出台的内在原因是国家对许多有识之士所关心问题的一种现实反应。这些所关心问题包括:教育正变成少数人的特权;如何教育这些少数人,使他们具备专门的技能,并懂得如何造福社会和为多数人服务;学校教育越来越理论化、抽象化,很少涉及到农村变革的实际问题和根本性问题。有些教育家还担心:过多的聘用外国教师和使用外国课本、书籍以及其他各类教学资料,将会逐渐加重受教育的埃塞人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生疏感,并最终与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相脱离。^[7]

(二) 大学服务计划的实施

埃塞大学服务计划的正式启动是在1964年4月17日。计划从提出设想到付诸实施,还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讨论和研究过程。当计划获得了大

学学术圈内(包括学生)的支持时,学校组织了几个研究小组对此计划的可行性进行调研。其中的两个委员会研究了计划的可行性并向教职工参议会的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草案,执行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后把草案提交给教职工参议会,教职工参议会同意并批准了这项计划。这项计划最终得到了校务理事会的支持并受到政府的欢迎。第一支大学生服务小组于1964年9月派出。

根据计划方案,每一位全日制在校大学生都要到农村社区服务一年,服务的具体岗位和内容与自己所学的专业相关,学生服务期间由用人单位发放适当的生活补贴。该计划拟指派60%的学生到农村学校工作,40%的学生到农村城镇的各市民服务机构锻炼。事实上,有73%的学生被派到了学校教书,另27%的学生被派到了其它部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教师的大量短缺和其它部门在组织安排上存在问题所致。

在1964到1974年的十年期间,一共有3792名学生被派到不同地区进行社会服务活动。除了从事教学工作外,也有在行政部门、法院或税务机关、社区发展办、建筑工地、地方银行及其它与学习专业相关的部门服务。

虽然大学服务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但它真正的最大好处却是教育的。如参加服务的学生深切体会并了解到大部分埃塞人的生活方式,体验到在特定环境下实践经验的价值所在,从而会激发他们更加关注农村问题以及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变化。这项计划还给予学生们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联系起来的机会,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机会来开展一项完整的研究计划

表一: 1964—1974年埃塞大学服务计划参加人数^[8](按学科专业和教学—非教学岗位统计)

学科专业	学校教学岗位	非学校岗位	总计
农学	317	149	466
文科(包括社会科学)	394	61	455
商业管理	456	85	541
教育	1134	17	1151
法律	12	169	181
药学	1	82	83
自然科学	195	62	257
社会工作	14	72	86
技术学	186	291	477
神学	62		62
总计	2771	988	3759

表二：1964—1974 年埃塞大学服务计划参加人数统计^[9]

学年	参加人数	学年	参加人数
1964/ 65	129	1969/ 70	558
1965/ 66	189	1970/ 71	472
1966/ 67	261	1971/ 72	561
1967/ 68	349	1972/ 73	303
1968/ 69	394	1973/ 74	543

注：1972/ 73 学年之所以参加人数下降是由于 1971/ 72 年的学生骚乱所致。

——这往往成为他们所写优秀论文的一部分。据大学权威人士声称，外界对这些论文评价很高。教师本人也常常通过对学生的指导、帮助学生选择服务项目、编写服务课程计划、指导和分派学生进行项目研究、保持与本专业学生的联系与研讨等而参与到服务计划中来，并从中受到启发，从而改进以后的教学和研究。

当然，大学服务计划的实施并不是完美无缺、面面俱到的。比如计划除了有一个学术性要求外，并没有把这种学术性要求换算成一定的学分记入学生的学业成绩档案，甚至可以抵消部分课程学习或作业的替换。这样就缺少了一种激励机制和从学期的角度对计划进行评价。有人建议，如果把每项服务计划换算成 3 到 6 个学分，将更有利于计划的深入开展，更能够调动学生和老师的积极性。

(三) 大学服务计划的延伸

埃塞的大学服务计划还吸引了世界各地众多的参观者，他们给计划的评价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冒险活动；一条试图发现能够把学术工作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情境联系起来的真实的兴趣特征；研究发现受到鼓励，大学为同胞服务的职责得到重视和赏识；对天才的一种激励等。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有的学者认为：计划为埃塞学生中的激进主义者提供了活动的土壤。

大学服务计划不但被非洲的许多国家所效仿，如赞比亚、坦桑尼亚、扎伊尔等，后来还被非洲以外的许多国家所赶超，如前苏联、美国等国家的一些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政府和大学双方对计划的进一步考察和论证，埃塞政府后来出台了一项建议，要求把服务计划扩展到在校中学生。

随着服务计划的推进，塞拉西大学于 1973 年又拟订了一个新的大学服务农村计划，设想到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90 年代将进一步扩大服务计划的范围。新的大学服务计划的提出主要是基

于 1972 年政府出台的一项教育改革政策——刊登在著名的《教育评论》(the Education Sector Review) 上。^[10] 塞拉西大学的许多教师参与了这项政策的起草工作，但当这项政策公诸于世时，公众的反响却相当的低调，不久就爆发了 1974 年革命，君主政权倒台，改革议案也就随之搁浅。

《教育评论》中刊登的这篇政策报导建议政府要以每年 5% 的增长速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直到二十世纪末。按照 1968 年的塞拉西大学发展计划，该项扩招计划主要是在农村的两个校区即阿莱玛亚和贡德尔校区进行。这样，这两个学院的学生将被分配到教育、技术、农业、社区发展、医学与卫生服务等专业方面的学习，以满足师资的需要。

当然，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梦想，这就是要在大学与社会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通道，尤其是与农村贫困人群的联系。这也正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大学社会服务功能问题。应该说，埃塞大学在社会服务方面一直走在许多大学的前面，这些年来它也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是在 1973 年大旱事件中塞拉西大学的各党派组织对受灾穷人所做出的积极反应和勇敢行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1973 年在沃洛 (Wollo) 和提格里 (Tigray) 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许多饥民开始逃荒到亚的斯亚贝巴，但政府为了掩盖真相却拘禁了这些难民，埃塞大学教师联合会的成员们主持正义，勇敢地揭露了事情的真相，政府不得不采取补救行动。1973 年 4 月，一个由三名大学高级成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乘坐专机前往沃洛灾区进行灾情评估。委员会成员带回了许多照片，进一步证实了灾情的范围和灾情的严重性。当这些照片在 HSIU 校园展出时，引起了国内外社会的极大关注，尽管这令埃塞的政府官员感到恼火。不久这些照片又上了英国在埃塞开办的一家著名的电视台，这一晚正好是君主政权

被推翻的前一夜。

很快,塞拉西大学的老师、学生及其他人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即“大学赈灾委员会”(UFRC)。委员会及时报导灾情发展,积极募捐善款救助灾民。有些来自偏远农村、身无分文的学生们,为了帮助灾民,宁愿饿着肚子,把早餐的钱省下来捐给灾民。

后来,“大学赈灾委员会”又更名为“大学赈灾与恢复组织”(UFRRO),拓宽了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从原来的单一救济转向救济与恢复并重,委员会在受灾点建立了多个合作减灾项目,帮助灾区恢复重建。直到1974年埃塞革命爆发,UFRRO的工作还在继续,后被新政权停止。

埃塞大学开创了国内第一个人道主义救援组织UFRRO,后来成为埃塞政府救援组织——“赈灾与恢复委员会”(RRC)和现在的“疾病预防与控制委员会”(DPPC)的前身。

塞拉西政权垮台后,新政权于1975年初关闭了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更名为“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并把六万名学生和教师派往农村参加合作发展运动,目的是为了推进土地改革、提高农业产量、改善农村卫生状况、加强地方管理、提高农民识字率、向农民传授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其中的一项成功之举是国家识字运动。该运动开始于1975年,当时政府动员了六万多名大中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到全国各地开展为期两年的识字教学服务。识字运动以每个大中城市为中心,然后向外、向农村扩展,延伸到偏远地区,前后共分十二轮。官方安排的识字培训一共有五种语言,分别是阿姆哈拉语、奥罗莫语、提革里亚语、维拉莫语和索马里语,后来扩大到十五种语言,覆盖大约93%的人口,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1979年随着国家识字运动协调委员会(NLCCC)的成立,识字运动进入高潮。到80年代末第十二轮结束时,全国大约有1700万人报名参加了识字班学习,其中有1200万人通过测试,女性占了半数左右。识字运动受到了国际上的称赞。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埃塞国际阅读协会识字奖章(th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Literacy Prize)。识字运动实施者主体是大学师生,因此可视为是大学服务社会的拓展或延续。

三、结语

从历史层面看,六十年代发生在埃塞的学生运动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国际大环境影响:当时非洲殖民国家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一些国家如火如荼,埃塞虽不是殖民国家,但埃塞是一个帝王统治的封建国家,一些激进的思想很容易被具有反叛精神的青年学生所接受和传扬;二是国内大学校园里开展的自治运动及自由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思想宣传作用。埃塞贫穷的国家现实,使这些热血青年有了改变贫困的社会责任感,并且力求身体力行寻求改变一切社会不公和治疗一切社会创伤的良方,从而导致了大学服务计划的诞生。大学服务计划在目标任务、服务期限上都十分明确,组织管理上也有序不紊,而且与学生的专业学习背景相关联,曾引起过世界性的关注。虽然由于政治原因,埃塞大学服务计划最终不得不草草收场,显得有些虎头蛇尾,但大学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和时代精神却受到广泛传扬和推崇。

参考文献:

- [1] [2] Abebe Ambachew. Academic Freedom in a University of a Developing Country[M]. Dialogue: A Public Action of Ethiopian University Teachers' Association, 1968, 2(1): 28, 28-36.
- [3] AAU 1943-1993(College Poems 1950-2000). Addis Ababa: Bole Printing Press, 2000.
- [4] Ahula, P. Addis Ababa University College Ethnological Society Bulletin Vol. iv(1-10) and Vol. ⑤(1), 1953-1961. Addis Ababa: AAU Printing Press, 2002.
- [5] Kiflu Tadesse. The Generation, The History of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Part 1)[M]. Trenton, N.J: The Red Sea Press, 1993: 39.
- [6] Mesfin Wolde Mariam. The Rural-Urban Split in Ethiopia[M]. DIALOGUE: A Publication of Ethiopian University Teachers' Association, 1968, 2(1): 7-16.
- [7] Aklilu Habte. Higher Education in Ethiopia in the 1970s and beyond[C]. A paper prepared for Bellagio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Unpublished), 1973.
- [8] [9] Aklilu Habte. Higher Education in Ethiopia in the 1970s and beyond[M], 1973: 44, 43.
- [10] Girma Amare, et al. Aims and Objectives of Education in Ethiopia[J]. The Ethiop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974, 6(2): 1-26.

(责任校对:周巧学)